

金梁羽庸生 通俗小说欣赏

潘亚瞰 汪义生 著



广西教育出版社

内 容 提 要

武侠小说是通俗文学的一大类。金庸、梁羽生是遐迩闻名的新派武侠小说的代表作家，他们的作品雅俗共赏，风靡港台、大陆，影响遍及海外。本书作者从金庸、梁羽生的代表作品中撷取精彩的片断，从思想和艺术方面进行细致深入的分析，见解独到，可帮助读者领略到小说的精妙之处。书中的总论对武侠小说的源流衍变、审美特征以及新旧武侠小说的异同、新派武侠小说的风格特色等都作了扼要的介绍，使读者对武侠小说有一个总体的了解。《金庸小说评析》、《金庸年表》、《梁羽生小说评析》、《梁羽生年表》对这两位作家的生平、思想脉络、创作过程、艺术个性都有较为清晰的论述，对引导读者进入更高层次的欣赏境界有很大的帮助。

金 廉 梁羽生通俗小说

潘亚敬 汪义生



广西教育出版社出版

(南宁市民族大道68号)

广西新华书店发行 广西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 1/28 10 $\frac{6}{14}$ 印张 插页3 190千字

1993年2月第1版 1993年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000册

ISBN 7—5435—1748—5/I·168 定价：5.30元

(桂)新登字05号

《中国现代作家作品欣赏丛书》序

姚雪垠

我国现代文学开始于“五四”时期的新文化运动，是在提倡科学与民主的历史要求下诞生的，因而它是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文化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它一开始就同人民的命运联系密切。在“五四”时期重点介绍近代西洋的现实主义文学作品和理论，又介绍世界弱小民族文学，就是出于我国具体的历史社会背景。在我国虽然也有过如创造社这样有影响的文学团体提倡浪漫主义，各种流派也曾竞相争鸣，致使文苑百花竟发，但是新文学的主流是现实主义，几十年来是沿着现实主义的道路向前发展的。

现实主义，“为人生的文学”，反帝反封建的爱国主义精神，提倡科学与民主的进步思想，这就是“五四”文学的革命传统。后来随着革命的不断发展，对现实主义的思想内容不断提高，但是直到今天，我国的文学仍然是发扬和发展这一传统，而不是忽视——更不是背离这一传统。如今使青年人了解新文学的“五四”传统，认识几十年来新文学所走过的战斗的光辉道路，十分必要。现由广西人民出版社约请一些大学现代文学的教师和文研单位的现代文学研究工作者共同撰写一套《中国现代作家作品欣赏丛书》，从今年开始陆续出版。可以

帮助青年读者大体上认识“五四”以后新文学的丰富收获和光辉传统。

现代中国在经济和科学技术方面是一个落后的国家，但是在文学方面却是一个先进的国家。先进就先进在她的文学不是颓废的、黄色的，空虚而无聊的、贩卖低级趣味的，而是一贯沿着现实主义的道路向前发展，为着现实主义的崇高理想而奋斗。我们已经产生了如鲁迅、茅盾、郭沫若这样的伟大作家，还产生了许多杰出的和优秀的作家。我相信，由于打倒了“四人帮”，思想和文学得到解放，今后若干年中必将继续产生更多的伟大和杰出的作品和作家。但是我们的文学创作道路必须善于继承和发扬我国三千年的，尤其是“五四”以来的光辉传统，同时还要认真纠正我们曾经走过的一些弯路，这样才能创造无愧于我们伟大时代的作品。

一九八一年四月五日于北京

编　辑　例　言

一、《中国现代作家作品欣赏丛书》旨在研究“五四”以来中国作家的艺术风格。以“五四”为起点的中国现代文学，开创了我国文学史的新时期，出现了群星灿烂，百花竞发的局面，不论在思想上和艺术上均有前所未有的成就。本丛书主要通过对作家具体作品的集中赏析，显现作家的艺术灵魂；汇映中国现代文学史的风貌，从而帮助我国大、中学生及文学爱好者扩大文学知识视域，提高文艺鉴赏能力，丰富精神生活，并促进当前社会主义文学创作的繁荣和发展。

二、《中国现代作家作品欣赏丛书》以鉴赏为审美主要手段，并辅以评论专文和年表。欣赏文章力求结合文学史、作家创作道路，及其美学思想，准确而精细地剖析作品的思想艺术特色；评论专文要求较全面地综论作家和创作风格，评述其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和贡献；年表则扼要地反映作家生活和创作情况；三者结合，形成有机整体，以映现某一作家独特的艺术个性。

三、《中国现代作家作品欣赏丛书》主要选择能够体现某一作家艺术风格和特色的代表作。一般以短篇为主，中、长篇和多幕剧则节选。同时根据不同作家的具体情况，或侧重某种文体，或以一种体裁为主兼顾其他。本丛书将依据具体情况出一位作家的专辑或几个作家的合辑。为方便读者均刊有原作。

四、《中国现代作家作品欣赏丛书》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要求撰写者立论鲜明，各抒己见，言之成理，不落俗套。具体写法，不拘一格，文字力求清新活泼，深入浅出，雅俗共赏。

五、《中国现代作家作品欣赏丛书》原属广西人民出版社文教编辑室业务。文教编辑室现经中华人民共和国新闻出版署批示扩建为广西教育出版社。因此，本丛书的编务和出版今后概由广西教育出版社负责。

广西教育出版社

1989.3.15

目 录

《中国现代作家作品欣赏丛书》序	姚雪垠
编辑例言	
独具特色的新派武侠小说	(1)
金庸小说欣赏	
书剑恩仇录(十九回节选)	(39)
《书剑恩仇录》赏析	(66)
天龙八部(十五回节选)	(73)
《天龙八部》赏析	(93)
侠客行(十九)	(101)
《侠客行》赏析	(132)
鹿鼎记(第五回节选)	(139)
《鹿鼎记》赏析	(166)
梁羽生小说欣赏	
白发魔女传(第二十六回)	(175)
《白发魔女传》赏析	(202)
七剑下天山(第十六回)	(212)
《七剑下天山》赏析	(237)
萍踪侠影录(第二十回)	(245)
《萍踪侠影录》赏析	(266)
金庸年表	(274)
梁羽生年表	(279)

独具特色的新派武侠小说

武侠小说是台港通俗文学的一大门类，自50年代起，即掀起“新派武侠小说”热潮，陆续涌现出以梁羽生、金庸、古龙为代表的一批创作高手。近10年来，中国大陆也出现“武侠小说热”，金庸、梁羽生、古龙的小说受到众多读者的欢迎。出版社还重新整理出版了一批早期的武侠小说，如清代的《七侠五义》和民初的《荒江女侠》等。

武侠小说是为大众所喜闻乐见的文学作品，但其地位和表现社会生活的独特方式一直没有得到应有的确认。在许多“正统”文人眼里，武侠小说是一种媚俗浅、不能登文学大雅之堂的通俗读物，认为小说中所描述的那种原始的争斗方式，反映的是脱离生活的落后文化。对于武侠小说独特的审美情趣，长盛不衰的读者市场，它在中国文化史上的价值及其衍变历史和文学地位，以及重要作家的艺术成就、独特风格，还很少作过系统、深入的探讨。

如今，以金庸、梁羽生、古龙为代表的新派武侠小说，在内容与形式、风格与技法方面的演变和发展，已开始受到一些海内外文化界人士的关注。特别是1997年即将到来，香港回归祖国怀抱的这一历史性时刻已临近了。广大民众所关心的不仅是领土的连接、两地政治与经济的沟通，自然也包括文化上的融合。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来研究已在大陆产生广泛影响的新派武侠小说，或许是合乎时宜和有现实意义的。

一、武侠小说的历史衍变

中国武侠小说渊源甚远，国内有些学者认为，唐人传奇中的《虬髯客传》等传奇，为武侠小说的发端。《辞海》中的“武侠小说”条目写道：“中国旧小说的一种。在唐人传奇的若干作品中已具雏形，到清代有了发展，逐渐成为定型的长篇小说。”

远在先秦诸子百家学说中，武侠的形象就已出现了。春秋战国时代，封建领主制度开始崩溃，一些流离失所的贵族后裔和下层社会的剽悍子弟，变成了游侠和辩士，如当时的贵族孟尝君等就蓄养了许多游侠之士。先秦诸子对武侠大抵持否定态度。《庄子·说剑》载：“昔赵文王喜剑，剑士夹门而客三千余人，日夜相击于前，死伤者步百余。韩非子将武侠列为五蠹之一，指出：“侠以武犯禁”。孔子对武侠的看法也大抵如此。

司马迁是为武侠翻案的第一人。他在《史记》中专门写了一卷“刺客列传”和一卷“游侠列传”，塑造了朱家、郭解、荆轲等一系列武侠形象。司马迁对他们的评价是：“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承，不爱其躯，赴世之厄困。”（《史记·游侠列传》）。他们中的一些人从事行刺，并非滥杀无辜，大都有比较明确的目的。司马迁写的虽是历史，但对后世的武侠小说作家无疑产生了深刻影响。到了六朝，干宝的《搜神记》中有著名的“干将莫邪”篇，写无名客为莫邪报仇刺楚王的故事。这一具有鲜明个性的刺客形象，后来被鲁迅写进他

的历史小说《铸剑》。

唐人传奇中载有大量侠客轶事，标志着中国武侠小说已正式登上文坛，到当代武侠小说，这绵延千余年的文学发展史足以说明中国武侠小说源远流长，是中国民族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宋话本中的武侠小说，在艺术上较为成熟，受到鲁迅称赞。到清末由话本故事演变而来的公案小说曾盛行一时，这些带有公案情节的小说出现，标志着武侠小说的发展进入新的阶段。《儿女英雄传》、《三侠五义》可说是当时武侠小说的代表作。而著名的《施公案》、《彭公案》塑造了协助清官破案的武侠捕快的形象。据不完全统计，从19世纪70年代到20世纪20年代，《儿女英雄传》就有18个版本问世；《三侠五义》（和据此改编的《七侠五义》）有近70个版本问世，至于未能统计的坊间翻刻印本，那就更多了。清末武侠小说拥有的读者之多，可见一斑。

清末的武侠小说作者大都是民间艺人。从民初，特别是20年代以来，一大批受过“五四”新文化运动洗礼的知识分子走上了武侠小说的创作道路，他们的作品带有新的时代气息，与清末武侠小说相比呈现出不同的审美趣味，洋溢着某种民主思想气息。以表现手法而言，本阶段的武侠小说大体可分三类：1、以历史事件为背景，主人公的事迹有史实为依据，又大量熔入野史轶闻，如文公直的《碧血丹心大侠传》，顾明达的《海上英雄》。2、情节荒诞离奇，猎奇弄险，想象奇幻，如还珠楼主（徐寿民）的《蜀山剑侠传》等。3、书中人物虽是虚构的，但社会背景和史实又有一定真实性的，如王度庐的《卧虎藏龙》等。当时人称平江不肖生、赵焕

亭、顾明达、白羽、还珠楼主为武侠小说五大家。

40年代以来，武侠小说开始走向没落，一些作者为了迎合市民阶层中的低级趣味，廉价追求感官刺激，诲淫诲盗，荒诞不经，诱人逃避现实，消极颓废，声誉江河日下。

50年代初，梁羽生创作《龙虎斗京华》，武侠小说再度勃兴，并显示破格求新的发展势头。武侠小说在香港的兴起有其社会背景。早在三、四十年代，进步作家两度南来香港，大力垦荒播种，先后掀起两次文化高潮，进步文学席卷港澳，武侠小说黯然失色，乏人问津。50年代滞留香港的进步文化人士大批涌返内地，而内地许多“落难”文人则流入香港，一时反共文学在美元支持下，甚嚣尘上。但百分之九十八的港人与祖国骨肉相联，他们眷念故土。1952年，梁羽生首先以祖国文化创作新派武侠小说，遂一炮打响，广受读者欢迎。然后金庸异军突起，接下来就涌现一批武侠小说作者队伍。

梁羽生、金庸在香港崛起之后，台湾的古龙也开始大行其道，从60年代初古龙开始创作武侠小说，于是台湾的武侠小说发展进入全盛时期。在新武侠小说领地，古龙与金庸、梁羽生可谓三足鼎立。

二、武侠小说独特的审美取向

中国武侠小说能够绵延千年而不绝，决非偶然。人民性、民族性、通俗性，成为武侠小说独特的审美取向，也是它的生命力之所在。

历代的武侠小说普遍表现出忧国忧民，同情受欺凌受盘剥的下层人民的进步倾向，不同程度地展示了社会

矛盾，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人民群众的情绪和愿望，表现人民所憧憬的美好生活。武侠小说的人民性突出地表现在人物形象的塑造上。它把下层社会的“小人物”推上了作品的主人公地位，于习常风俗的氛围中，塑造出各种民间英雄形象，这些人物不仅武艺超群，在他们身上还强烈地体现出中华民族向来推崇的侠肝义胆、刚性热肠的美好情操。金庸、梁羽生和古龙的小说正继承了旧武侠小说的人民性的因素，并使之进一步发扬光大。

武侠小说之所以长盛不衰，跟它所蕴含的强烈的民族性也有直接的内因。香港作家项庄（董千里）认为，新武侠小说近20年来在海外掀起高潮的原因，“无疑与海外华人的精神极度苦闷有关。千千万万人通过新武侠小说建立起对中华文化的认同，对锦绣江山的向往，对人物情意的赞美。”武侠小说从一千年前刚开始出现时，就打上了中华文化的鲜明印记，展示了令人目眩神迷的十八般武艺。主人公非凡的武功，有以柔克刚的八卦掌，有诡异莫测的剑法，有凶猛的拳术，有刚烈的刀功，有致人于死地的各种绝招，也有刀枪不入的护体神功，令读者惊叹不已。而新派武侠小说家作品中的民族性又有了提升和丰富，它对佛、道、儒、墨思想的浸润，和对唐诗宋词的艺术境界的融汇，则大大提高了新武侠小说的艺术品味。金庸将武术之道上升到哲理的高度，梁羽生的武侠小说以旧体诗词入书，文笔清新典雅，加之新武侠小说与儒家文化“杀身成仁，舍生取义”，“富贵不淫，威武不屈，贫贱不移”的紧密联系，使人感受到一股扑面而来的中国文化气息。

华罗庚说过，武侠小说是“成人童话”，这是对武侠小说特质的非常形象化的概括。这同时也决定了武侠

小说应具有的通俗性、迎合性的特点，让读者在阅读过程中轻松愉悦，获得刺激和消遣。诡秘离奇、扑朔迷离的情节，头尾完整的故事，尖锐的矛盾，节外生枝、波澜起伏、悲喜交集的构架，使读者得到好奇心的满足，随着阅读作一次精神探险。

三、新旧武侠小说之对比

发韧于50年代初的新武侠小说与旧武侠小说相比，其思想内涵、情感意向、审美情趣和人物塑造、表现技巧诸方面，都有新的发展和变异。新武侠小说是高度商业化的都市社会产物，其中便很自然地渗透了浓重的现代市民意识。较之旧武侠小说，其艺术视野之宏阔，风格之多样，以及节奏、韵味，均令人感受到一股现代气息。

读旧武侠小说，深感封建伦理道德对作者思想的禁锢，他们笔下的“义士”、“侠客”尽管有除暴安民、劫富济贫的义举，但毕竟未能冲破封建宗法社会的局面。如《三侠五义》中的主人公，几乎都在为朝廷卖命；《儿女英雄传》中的十三妹，曾是武勇洒脱的江湖女侠，一朝当了安府的媳妇，便皈依了以三纲五常为基础的封建伦理道德观念。民初到40年代的武侠小说，受五四新文化运动影响，开始出现民主思想端倪，作品中的人物一般不再依附官府行侠仗义，表现出对自由自在的人生的向往，但其深层意识中尚难以完全摆脱忠孝节义的桎梏，侠士们所流行的“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思维模式，仍未超越封建社会的价值观念和行为准

则。

新武侠小说则打破了旧武侠小说中的封建正统观念的羁绊和“武侠——清官（或开明国君）——恶霸”的三元结构。新武侠小说通常不是写侠士英雄与豪强的斗争，而是主要表现侠与侠之间的矛盾冲突，由此展开善与恶之间的殊死搏斗，并且完全突破了传统的因果报应模式。难能可贵的是，在描写武林高手之间的冲突时，并不是纠缠于门派之争或一般意义上的善恶忠奸冲突，小说中的主人公往往是正义的化身，他们能以国家、民族利益为最高原则，在与外族侵略者和封建统治者的斗争中不惜舍身取义。例如，《射雕英雄传》中的郭靖，为保卫大宋江山，坚守襄阳数十年。在这些侠士英豪身上，洋溢着爱国主义的思想光辉，显示出一股凛然正气。同时情节发展合乎逻辑地穿插了主要人物曲曲折折的爱情纠葛，给人以独特的审美愉悦感。在主人公身上焕发出的“忧生灵于水火，急社稷于安危”的爱国思想和民族意识，引起了读者道德上的认同。

文学是人学，武侠小说也不例外。旧武侠小说往往只注重情节，而忽视了人物的塑造。如果说旧武侠小说在人物描写上显得粗疏、浮泛，流于概念化、平面化，那么，新武侠小说的人物形象就显得多姿多彩，呈现出丰满的立体感。金庸、梁羽生、古龙在刻划人物时，都注重调动各种艺术手段，将人物置于复杂的矛盾冲突中，在正反、对立、善恶的渗透、转化中显示性格的多样性，并注意表现人物内心世界的波澜。作品中的多数人物都不是类型化的，而有各自鲜明的性格特征。即使在刻划反面人物性格时也力避漫画化，而是通过生动客观的描写，突出其个性。

旧武侠小说写法陈旧，情节单一，形成封闭式叙事模式。新武侠小说作者大多是文化素养较高的学人，他们学贯中西，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又能放开视野，引进一些西方小说技法，使他们的作品具有标新立异、花样翻新的特点。可喜的是，金庸、梁羽生在借鉴西方小说的表现手法时，行文并无欧化之弊，基本上不采用西方小说那种大段心理分析的手法，而是借助人物个性化的语言和行动来揭示其心灵世界，这符合中国读者的欣赏习惯。

在武功描写方面，旧武侠小说主要渲染各种外功；新武侠小说感兴趣的是各种内功、气功、点穴，表现五花八门的暗器、毒药以及心术方面的较量。这些表现武功时的新取向并不是偶然的，它揉合了当今一些科技文化知识，为作品平添了现代色彩，增强了读者的兴味。

四、新派武侠小说的 开山鼻祖——梁羽生

梁羽生早年在岭南大学时攻读的是经济学，但他更有兴趣的是文学和史学。毕业后，他投身报界，改行从事文史研究工作。后来他大写起武侠小说来，虽说出自偶然的机缘，却也有其内在的必然性。

1952年，梁羽生在香港《新晚报》上连载他的第一部武侠小说《龙虎斗京华》。这与以往其他作者推出的武侠小说迥然不同，文中所叙述的史实，所展示的地理环境，均经过严格的考据，内容有武有文，人物性格鲜明，古代武林人物的行为、心理与特定的历史氛围溶为一体，情节曲折跌宕，并穿插了缠绵悱恻的爱情故事，

耐人寻味的哲理，色彩斑斓的写景和韵味盎然的抒情，文笔潇洒流畅。这部小说连载时，读者反应极为热烈，称之为新派武侠小说，连平素不爱看武侠小说的人也争阅其华章。

梁羽生写这部小说是受朋友之托，本打算交卷后就辍笔的，但由于读者呼声甚高，报馆缠住不放，于是便一部接一部往下写，连续了23年，共计写出35部（163本）长篇武侠小说，共一千多万字。梁羽生因有开山劈石之功，被人们尊为新派武侠小说鼻祖。他的小说还被译成英文、印尼文、柬埔寨文等文字出版，许多作品在美国和菲律宾、新加坡等东南亚国家中文报纸上转载。梁羽生为原来已穷途末路的武侠小说拓出一片崭新的艺术天地，为武侠小说创作带来了转机。

1

梁羽生武侠小说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兼有历史小说之长，他是尝试将重大历史题材引入武侠小说中的第一人。梁羽生对历史素有研究，50年代前期，他曾以“梁慧如”的笔名写过不少内涵隽永的历史小品，后来结集出版。

有人称梁羽生的小说是“历史小说武侠化”，或是“武侠小说历史化”，对此有过不同意见，褒贬不一。褒者认为，这样可提高武侠小说的品味；贬者认为，其结果使人物背离了侠的本色。梁羽生则认为：“小说中的‘历史人物’和历史家笔下的‘历史人物’不同，历史家要叙述‘实在的事件’，如果某人没有做过某事，那就不能‘生造自编’。可是小说中的历史人物，却

必每一点都吻合历史事实，小说的作者可以写‘可能发生的事’。……把历史通过艺术的安排，把历史人物刻画得更具体生动，这就是对涉及历史人物的创作的要求。”梁羽生的小说，就是他这一主张的艺术实践。

梁羽生有很多武侠小说是根据史实（包括正史和野史）而写成的，如《女帝奇英传》取材于唐代武则天的生平事迹，生动地再现了这位名垂青史的女性在充满血雨腥风的宫廷争斗中如何力挫群雄，登基称帝，改国号为“周”的历史过程。梁羽生在落笔之前，对唐朝的政治、经济、法律、军事、道德、宗教、文化乃至宫廷生活、典章制度、民间习俗、风土人情等，都经过深入研究。他忠于史实，在小说中对武则天能纳谏，善于选拔人才并委以重任等政绩，以及豪奢专断等劣迹，皆作了较为客观的描述。梁羽生的代表作《萍踪侠影录》也大体上是忠实于《明史》的。由于对历史资料作了深入细致的考证，梁羽生的武侠小说兼有历史小说之长，加上作者非凡的艺术想象力，使他的作品产生了一种特殊的艺术魅力。它符合历史的真实，又有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和感人的艺术氛围。

梁羽生是位创作态度严谨的作家，为了使作品言而有据，他花费在收集、查阅资料上的时间，常常比正式动笔写作的时间还多。由于写的是侠客，就要闯荡江湖，云游四方，因而梁氏笔下人物行踪不定，顺其足迹，牵涉到的地理、历史、人物、风俗范围极广。他下笔之前，凡遇到那些自己不曾涉足的地方，总是多方查找资料，以求真实贴切地表述。他的许多小说构成了一个以天山派武功为线索的系列。他并未到过天山，借助许多游记，包括登山队员的日记，使他对天山有了详尽的了解。